

姚大力 著



北方民族史十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姚大力 著



北方民族史十論

陳得芝 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民族史十论/姚大力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

ISBN 978 - 7 - 5633 - 6641 - 5

I. 北… II. 姚… III. 古代民族-民族历史-中国-文集 IV. K28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671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395790 - 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 × 1 300mm 1/32

印张:8.875 字数:245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39 - 2925659

作者简介

姚大力，1949年生。1975年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史地系；198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研究生院。198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授予的历史学博士学位。1987年至1991年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1996年调复旦大学。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曾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学系、庆应大学等作访问学者，并担任过高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的客座教授。先后发表过近三十篇有关蒙元史和北方民族史的专题论文。

组稿编辑：竺金琳
责任编辑：张 静
责任质检：竺金琳
装帧设计：孙豫苏

目 录

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

——读《魏书·序纪》 / 1

“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

——论清中叶前“满洲”认同的历史变迁 / 18

“回回祖国”与回族认同的历史变迁 / 64

附录一 对《“回回祖国”与回族认同的历史变迁》的两点补正 / 114

附录二 元代泉州《清净寺记》碑文的文本复原 / 116

附录三 回族形成问题再探讨(报告稿) / 120

追寻回民意识的当代心灵历程

——读《心灵史》 / 126

“狼生”传说与早期蒙古部族的构成

——与突厥先世史的比较 / 141

塞北游牧社会走向文明的历程 / 164

“成吉思汗”,还是“成吉思合罕”?

——兼论《元朝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 / 202

曲出律败亡地点考 / 220

马札尔人是西迁的靺鞨部后人吗?

——评《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 / 233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 / 258

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

——读《魏书·序纪》

与突厥、蒙古等族的祖先传说相比,《魏书·序纪》所记载的拓跋鲜卑人对远古的记忆,显然更强烈地受到了当日中原文化的影响。今人在研读《魏书·序纪》时,往往会发现诸多颇费思酌而又未易析解之处。这便在很大程度上与上述干扰因素有关。本文即拟遵循着中原文化是如何影响了拓跋鲜卑对远古史迹的重构这样一条线索,去解读《序纪》所遗留的若干谜团。

所谓中原文化的影响,至少包含两层不同的意思。首先,《魏书》是由汉人用汉文来书写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因此它当然会受到中原汉地历史编撰学传统的影响。霍尔姆格兰在分析“序纪”有关拓跋早期史的资料来源时曾写道:“在这里,魏收所能拥有的,无非是走了样的口头传说和他本人的汉文化的遗产”^①。魏收“本人的汉文化的遗产”,即指上面这一层意思而言。其次,所谓“走了样的口头传说”,则是魏收从事史学写作的素材。那中间虽然也渗入了中原文化

^① 霍尔姆格兰(Jennifer Holmgren):《代国编年纪:〈魏书〉卷一对早期拓跋史的记载》,堪培拉: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页18。

的深刻影响,但它所反映的基本上还应看作是北魏官方乃至拓跋鲜卑统治集团对自身根源性的解说,而不能将它视为只是汉人对那段历史的阐释。以紧接着就要讨论的拓跋氏出自黄帝后裔的见解为例,它不仅以“祖黄制朔”、“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等等言词常挂在北魏汉人大臣的嘴边,而且也以“魏之先出于黄帝”之类的标榜出现在很可能是由皇帝自己起草的诏制之中^①。

“序纪”记录的拓跋先世史,按它所给出信息的详略差异,可以分为三段。这个谱系远溯自黄帝之子昌意,谓其少子“受封北土”,其后一支世为鲜卑部“君长”,至名为“始均”者,“入仕尧世”,又受帝舜之命为“田祖”;始均之裔,“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这是第一段。从昌意到始均,《序纪》未明言其间世次;由始均而下,“爰历三代”,直到成皇帝毛之前,总共积六十六世^②。北魏时人承认,他们对这一段历史几乎一无所知:“自始均以后,至于成帝,其间世数久远,是以史弗能传”^③。

第二段从毛皇帝开始,历节皇帝贷、庄皇帝观、明皇帝楼、安皇帝越,总共五帝。与之前的六十六世不同,关于毛和毛以后的这几个人,史文虽然仍没有留下多少具体事迹,但至少都举出了他们的名讳。过去曾有人提出,拓跋先祖多单名,不太符合北族习俗,尤其是此后有献帝名邻,以 r- 或 l- 作为词首辅音,更与蒙古、突厥及通古斯诸语的语音规则相左(按这一分析也适用于明皇帝的单名楼)。因此他们认为,这个祖先谱系,很可能出于相当晚近的假托。不过正如内田吟风指出的,《通志·氏族略》将献帝的名讳写作拓跋与邻,考虑到拓跋珪原名拓跋珪陟,“与邻”应当是偶然被《通志》保留下来的献帝原名。上述诸帝的单名多为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拓跋后人所改,

① 《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一。《资治通鉴》卷一四〇,《齐纪》六,明帝建武三年(496年)引孝文帝诏。

② 《魏书》卷一,《序纪》。以下凡征引《序纪》,不再出注。按:《序纪》所言始均之裔“积六十七世”,应当包括成皇帝毛的一代在内。本文把毛的世次计入下一个阶段,所以这里只有六十六世。

③ 《魏书》卷五七,《高祐传》。成帝即成皇帝毛。



但是以此而推断整个系谱都属于后来人的虚拟,其根据仍然是不充分的^①。

拓跋先世史的第三段,从安皇帝之后的宣帝推演,下至诃汾共九世。拓跋鲜卑部的两次重大迁徙,就发生在这期间。诃汾之后的力微,被认为是真正创建北魏“帝业”的人^②。如果说《序纪》对这第三段的记载依然因仍着第二阶段记载的“口述史”性质,那么从拓跋力微时期(至少是从力微的后期)开始,北魏历史便进入它的“实录”阶段了。

既然自始均至毛“世数久远”、“史弗能传”,则所谓始均之裔积六十七世而至毛的说法,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最早认真地提出并试图解答这个问题的人,似为卜弼德。他指出,既然始均与舜同时,则他的活动年代,按照“标准年代学”,就应当是在纪元前大约 2 210 年上下。而“成皇帝毛”,在他看来是比照战国末的匈奴单于冒顿而虚构出来的,也就是说,毛的年代应当是公元前 200 年。这样,在始均和毛之间就应相隔 2 010 年。按三十年为一世计,正好六十七世^③。

卜弼德的上述见解确实极有想像力。但它也存在两个不可谓不重要的未周之处。首先,对于舜的“标准年代学”定位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是魏晋之际人们的认识吗?其次,说毛是后来的拓跋鲜卑人比拟冒顿而虚拟出来的祖先,究竟有什么根据?想来正是为着算术的需要,卜弼德才会在他的论证里安排这两个未经坐实的预设。

① 内田吟风:《魏书序纪及其世系记事考》,载同氏:《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版,页97。按:相同的例证,还有《魏书》中的叔孙建,其名讳在《宋书》里被记为涉珪幡能健。见霍尔姆格兰前揭书页12至页13。又按:自毛以后诸“皇帝”的谥号,为道武帝时所追尊,详下文。

② 《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一引李彪、崔光等议。

③ 卜弼德(P. A. Boodberg):《拓跋魏的语言》,载柯文(Alvin P. Cohen)编:《卜弼德著述选》,柏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页233。霍尔姆格兰前揭书页18已引述此说。

因此,且让我们放弃以毛比拟冒顿的假定,而改用拓跋鲜卑史上最早的确定纪年,即力微的生年(174年,尽管这个年代本身仍然是很可疑的,说详下)作计算下限。其次,还应当尽量采用南北朝时关于远古纪年的一般知识来确定舜的年代。当日流行的远古“标准年代学”数据,比较完整地保留到今天的至少有两组。其中之一见于西晋发掘的“汲冢”《竹书纪年》。据此,则西周共257年;商从灭夏算起共有岁496年;夏自禹至桀亡总471年,三者凡1224年^①。至于从东周开始到力微生年之间的所历年岁,则是一个常数,是为944年。两项相加,遂知舜的活动年代当在力微出生之前2168年。另一组数据可由《汉书·律历志》求得。自“上元”至秦亡(前206年)凡143025年,而“上元”至武王伐纣为142109年。两者相减,得西周至秦亡之间凡916年。这个数字,加上商(凡629年)、夏(凡432年)、舜(凡50年)的历年,再加从秦亡后至力微出生之间的379年,总共有2406年。按古意一世为三十年计,则2168年合七十二三世次,亦即舜的时代距力微之世为七十三四世。但这与拓跋人自己对其先世的推算不太合辙,这里不去说它。而2406年则共合八十世。从力微之前的诘汾往前数,追溯到毛之后的节思帝贷共十三世。二者相减,从舜时代的始均直到毛为止,恰好还剩下六十七世代!由此可知,北魏在追溯远古世系时所依据的,就是被记载在《汉书·律历志》中的那个“标准年代学”的版本。

应当指出,上面的演算完全不是试图建立拓跋古史的“确切”纪年,而是为了说明,北魏时候的人们在重构拓跋先世史时,为什么会把那一段“史弗能传”的蒙昧时期不多不少地说成有“六十七世”。

由此又可以产生出另外三点认识。一是上述推演过程按三十年为一世来计算从贷到诘汾之间的诸“皇帝”在位的总年数。但这样做却完全忽略了以下事实,即由贷至诘汾的十三代统治,其年限长短本来因人而异,没有固定的时间幅度,更何况拓跋前期传递部族统治权

^① 参阅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今本竹书纪年疏证》,黄永年校点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的支配原则是兄终弟及,因而按三十年一替换来计算十三代统治的时间长度,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但为了估算一段原本无纪年依据的过去究竟历时几何,除此之外,古代拓跋人还能有别的什么可行的处理办法?

其二,这一重构带有明显的汉化色彩,因为它显示出将拓跋部的先世史“嫁接”到中原古史的言说框架内的强烈倾向。从此种视角去分析《序纪》记载的拓跋先世史,就很容易发现,它的第一段只能是在后来依托着中原古史重新构拟出来的。据《山海经·大荒西经》:“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序记》所本即此。它的新发明,不过是将始均断为昌意“少子”的后裔,由此便把黄帝与始均之间的世代距离大大拉开了。《魏书·礼志一》说,太祖时“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建议尊土德而尚黄色。唯据《资治通鉴》,拓跋自谓黄帝之后,是采纳中原名士崔宏(即崔玄伯)之议的结果^①。《通鉴》的这个说法,其依据今已不可查考。但是从上文对这段叙事之来历的发掘看,我们也许只能赞叹司马光的眼光如炬。

最后,从毛开始的拓跋先世史的第二段和第三段,才是被保留下来的真正属于拓跋文化传统的口传史。然而这部口传史一开头就从势力已壮大到“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的“成皇帝毛”讲起,似乎已经不太完整了。在毛的事迹之前,本来大概还有一段出自拓跋部自身的祖先起源故事。但在采纳了现在为我们所知的那第一段叙事后,原先包括在口传史开头部分的起源传说,反而从拓跋人自己的记忆中消失了。

早期拓跋史的另一个谜团,是决定了该部历史命运的两次重大

^① 《资治通鉴》卷一一〇,《晋纪》三二,安帝隆安二年(398年)。按:《魏书》卷二三《卫操传》,拓跋猗迺死后,卫操“立碑于大邗城南,以颂功德”。此碑在孝文帝初掘出,碑文因得传世。据卫操本传,碑文以“魏轩辕之苗裔”起首,是则拓跋为黄帝后裔之说远早于崔宏即已流行。钱大昕曾指出,这块碑中“魏”的国号及“桓穆二帝”之谥号都出于后世追改,他因此怀疑开头第一字“魏”原应写作“拓跋鲜卑”。唯从碑文通篇皆以四言成文看,“轩辕之苗裔”一句也很像是经后世追改过的文字。司马光不采此碑证据,仍以拓跋氏接受黄帝之裔说是出自崔宏的建议,似乎是经过斟酌的。



迁徙的决策者,即先后拥有“推寅”称号的宣帝和献帝邻,与檀石槐部落联盟里的西部大人推寅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按照胡三省的看法,檀石槐联盟中的西部大人推寅,当即拓跋部的第一推寅,也就是宣帝^①。而依马长寿之见,檀石槐时代的推寅乃是拓跋部第二推寅,即献帝邻^②。黄烈认为,拓跋两推寅之中的无论哪一个,与檀石槐时的西部大人“在年代上均不相当”^③。田余庆则分别在他的两处研究中,先后将拓跋部的第二和第一推寅与檀石槐时期的西部推寅相勘同^④。拓跋部的两个推寅究竟能否与檀石槐的西部推寅相勘同,涉及到我们对拓跋部是否参加了檀石槐的军事联盟,以及他们的迁徙路线和迁徙时间表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所以非常值得作进一步的讨论。

据拓跋部的口传史,拓跋部族从它所居的“石室”(即今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境内的嘎仙洞)所在地第一次向外迁徙,发生在以“推寅”为名号的人作部落君长的时代,这个推寅后来被北魏政权追尊为“宣帝”。对于拓跋部在宣帝领导下的迁徙所到达的地点,学术界的看法大体是一致的。文献与考古两方面的证据表明,史文所谓“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溟沮洳”,其所在应当是今扎赉诺尔(又名呼伦池)附近的草原地区^⑤。那么,这次迁徙应当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诸家对这次迁徙的发生时间多有推测,大多数人以为它应当是在公元1世纪之内。但因为缺乏比较明确的证据,所以这个问题至

① 《资治通鉴》卷七七,《魏纪》九,景元二年(261年)胡注。

②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页185至页186。

③ 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277至页278。

④ 田余庆:《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魏书·序纪〉有关史实解析》、《〈代歌〉、〈代记〉与北魏国史》,俱载同氏:《拓跋史探》,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页147、页219至页220。

⑤ 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文物》1977年第5期;黄烈前揭书,页277至页278;亦邻真等:《内蒙古历史地理》,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39至页40。最后一种文献对古代呼伦池周围“沮洳”的地貌环境有简明的描写,尤可参阅。唯关于拓跋部迁到这个地区的年代问题,黄烈以为“约在东汉前期”,这是他轻信《序纪》关于拓跋力微生于170年代的结果。亦邻真书更将这个年代上推到“西汉时”。本文接下来就要讨论这一点。



今难有确论。其实,关于宣帝的年代,《魏书·官氏志》里有一则非常珍贵的讯息,值得我们细加玩味。在述及“东方宇文、慕容”两姓氏时,《官氏志》写道:“即宣帝时东部,此二部最为强盛。”

按:宇文、慕容部之“强盛”于东部,绝对不会早于公元3世纪初。慕容部的人居东部,事在曹魏之初^①。关于宇文氏,史文虽有“南单于之远属,世居东部”之说^②,但他们从中部往东迁的历史也不太久远。据《周书·文帝纪》,“宇文”作为国姓,始于该部祖先普回获得三纽玉玺之后。普回传国于莫那,乃“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是曰‘献侯’,为魏舅生之国。九世至俟豆归,为慕容晃所灭”。普回、莫那之后的七世,均可于《北史·宇文莫槐传》考见。不过在那里,第九代传人的姓名被写作“逸豆归”而已。莫那子为莫槐;莫槐子普拔;普拔子丘不勤,尚力微之子拓跋绰的女儿,所以他应该是3世纪下半叶的人^③。也就是说,普拔当与力微同时,而宇文部东迁与普拔之世仅相隔一代。所以这件事至多也只会稍早于拓跋部的第二次迁徙。

那么,上述位居东部而正处于“最为强盛”状态的宇文、慕容部,是否可能与宣帝同时呢?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因为宇文、慕容两氏之徙居东部,都开始于3世纪初;而拓跋力微的活动之连续见于记载,最晚从力微二十九年(248年)也已经开始了。两者相距至多不过30来年。如果宣帝与强盛时期的宇文、慕容同时代,哪怕是两部只在东徙之初与宣帝末期稍相衔接,那么从景帝至诹汾共八帝的在位时间,包括统治年限相当长的献帝邻时期在内^④,也只能被压缩到总共二三十年的时间段之中。这是不合理的。

尽管《官氏志》把“宣帝时东部”指为宇文、慕容称强时的东部乃是一个错误,但它还是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宣帝之统治拓跋部,实在是与鲜卑划分为东、中、西三部,也就是檀石槐联盟

① 《魏书》卷九五,《徒何慕容廆传》:“曾祖莫护跋,魏初率部落入居辽西。”

② 《魏书》卷八一,《宇文忠之传》。按:类似的说法不止见于这一处。

③ 《北史》卷九八,《宇文莫槐传》。

④ 献帝邻因体力衰退而不克亲自指导拓跋部的第二次迁徙。由此可以推知他在位的年代一定很漫长。

(约 150—181 年)的存在大略同时。胡三省对两推演的勘同虽有所未安,但隐伏在这个断制之后的他对历史过程那一种感觉,即宣帝推演应与檀石槐同时,仍然是相当地切中事理的。姚薇元认为,《官氏志》的“即宣帝时东部”之语后面应加补“中部”一词,方为完整^①。他的意思是,慕容氏在檀石槐联盟中应属中部大人。可见他也把“宣帝时东部”理解为檀石槐时代的三部之一。田余庆推定宣帝率领的拓跋南迁发生在东汉恒帝时期(147—167 年),从时间的判断上无疑也把握了实情^②。

设若宣帝的年代果真与檀石槐联盟同时,那么拓跋部的两个推演就全都与檀石槐联盟中的西部大人推寅没有关系可言了。拓跋第一推演(即宣帝)虽然与西部大人推寅同时,但前者这时远在呼伦池之地,所以还不可能被檀石槐编入西部。第二推演则在时间上与宣帝、因而也与西部大人推寅相隔颇为久远,所以也无法将他与后者相勘同。换言之,当檀石槐在弹汗山创造震动中夏的业绩时,拓跋部很可能是在后方的草原上学习游牧。他们还来不及参加到更南面的檀石槐部落联盟中来。

以上讨论或许可以证明,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迁至呼伦池,比一般接受的推测还要更晚一些,亦即发生在公元 2 世纪的中叶。这样,它第二次南迁的年代,自然也要向后顺延了。

拓跋部第二次南迁的路线,大概最先是由呼伦池沿大兴安岭西麓朝西南行进。田余庆概括拓跋部先后两次南迁所遵循的路径说:“拓跋先人由大兴安岭地带辗转至于西辽河一带之时,前路已被阻滞,所以从那里西折,循漠南草原路线至于阴山,越阴山到达五原、云中、定襄地区”^③。《周书》记贺拔胜说:“其先与魏氏同出阴山”^④。

①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年版,页 170。

② 田余庆:《北魏后官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拓跋史探》,页 24。

③ 田余庆:《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拓跋史探》,页 147。

④ 《周书》卷一四,《贺拔胜传》。



可证拓跋部确实是南渡阴山而来到“匈奴故地”的。

诘汾率领的这次迁徙,所经地区“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历时年余。或者正如宿白推想,他们一度从今大兴安岭的西麓东折,进入山岭之中^①。陷入迷途的拓跋人因为获得一个“其形似马,其声类牛”的“神兽”引领,方能走出险境。内蒙古扎赉诺尔和吉林榆树都出土有“头带尖角,背树双翼”的鎏金飞马铜牌,学者们认为此种飞马形象就是拓跋传说中的神兽^②。神兽形象发现在扎赉诺尔,表明它在第二度南迁之前的拓跋部内已为人所熟知。有人甚而主张,它的造型受到经斯基泰文化东传的鸟首兽身式“格里芬”形象的影响^③。那么,拓跋部的第二次迁徙又该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我们知道,阴山之南的五原、云中、定襄之地,在檀石槐乃至以轲比能为首要人物的“后檀石槐时代”,向来是借以制约三部鲜卑的战略腹心地区。难以想像,拓跋部会在上述时段里成功地南越阴山,而不留下与原先就占据着该地的其他鲜卑势力作生死之搏的任何痕迹。所以结论只能是,拓跋部的第二次南迁,必定发生在后檀石槐势

① 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

② 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文物》1977年第11期。

③ 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中国学术》2001年第1辑。该论文页127载有两幅神兽图像,可参看。唯格里芬经常被表现在袭击偶蹄类动物的母题中。因此凡带有兽身的格里芬,其身体部位多带猛兽特征。拓跋鲜卑的神兽形象却是属于偶蹄类的马。它也许仅仅是一匹飞马,而与格里芬造型没有什么联系。另按:拓跋氏后来将自己附会为黄帝之裔,据此,北魏“宜为土德”。所以,原先“其形似马”的说法,这时候按“牛土畜”的观念被改作“神兽如牛”。见《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一。又按:关于被归属于迁徙途中之拓跋鲜卑的扎赉诺尔、巴林左旗南杨家村子等处遗址的年代,目前尚无法确切地予以判定。前者曾被推定为“东汉末”,而后面这个“遗址中唯一可以断代的器物”,乃是“东汉中南期的五铢钱”。这些见解与本文的分析颇相契合。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遗址也有飞马铜牌出土。该遗址被认为与扎赉诺尔遗址“有密切关系”,而遗址主人的文化及社会状况则比后者“发达一些”。发掘者将遗址的年代定为“东汉初或略晚”,在时间上或许有过早之嫌。这个远至松花江之滨的遗址究竟是否属于南迁路上的拓跋部,也很难确定。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2期;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

力在 230 年代被曹魏摧毁,漠南草原因而形成一段时间的权力真空的时候。这时离开拓跋部最初从大兴安岭出行到今呼伦贝尔草原,大约有七八十年的时间。

但是,这样地安排拓跋部南迁的时间表,会遇到另一个不容回避的困难。按《序纪》所说,“神元皇帝”力微执掌拓跋部的权力,开始于 220 年。如果拓跋部的第二次南迁发生在力微父亲诃汾的时代,它就应该在 220 年之前,而不可能晚至 230 年代。于是我们的问题就演变为:《序纪》关于拓跋力微的记载究竟是否完全可靠?

《序纪》所述力微事迹,至少存在两点可疑之处。一是从力微元年(220 年)之后,记事中断长达二十八年之久;直到力微二十九年(248 年)起,我们才开始读到有关此公活动的连续记载。在《序纪》以外的其他历史材料里,也找不到力微在 248 年之前的活动踪迹。其次,力微的寿命和他的统治年代都出奇地漫长。《序纪》告诉我们,他活了 104 岁(174—277 年),并且自 220 年算起在位长达 58 年之久!将以上两点联系在一起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力微的在位年限,似乎是在后来被人为地拉长了;而一旦将他的在位时代提前,他的出生年代也就必须跟着往前推。所以就有了他在位前期那完全空白的 28 年,以及超过百岁的长寿记录。可是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非要把拓跋力微的统治年代提前到 220 年?

就汉地社会的政治史而言,220 年所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非曹魏代汉莫属。乾嘉考据学家早已注意到“神元元年”与汉亡魏兴正好属同一年的巧合^①。不过这两件事之间实在没有什么联系可言。正如内田说过的:“由于全然看不出有谁故意把曹魏受命与力微部落的独立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的迹象,这不外乎完全地属于偶然的一致吧”^②。

话虽如此说,在汉人看来以曹魏代汉为最显著象征的 220 年,对

^①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六,“追尊二十八帝”条;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二八,“序纪”条。

^② 内田吟风:《魏书序纪及其世系记事考》,《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页 99。



鲜卑人也可能具有另一种更重要的意义。就在这一年，曹丕封后檀石槐时期的轲比能为附义王，又封东部大人素利弥加为归义王^①。对北魏时候的人而言，它完全可以被看作是自檀石槐以来鲜卑人共同体与中原王朝相互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当然，早在曹操当政的年代，后檀石槐鲜卑部落已与中原王朝“通贡献”，或曰“上贡献、通市”，其部落大人中也已有人被曹操“表宠以为王”^②。另外，轲比能本属“小种鲜卑”，而檀石槐的直系后人被曹魏封王，则晚在黄初二年之后。这些事实，似乎都不利于以220年作为鲜卑与中原王朝之间关系转折的标志性年代。

汉文记载中的“贡献”，反映了中原王朝从“朝贡—回赐”关系所看到的由藩属对中原王朝履行义务的那一面。但对“上贡献”的一方说来，它也可能只是一种贸易往来的关系。曹操执政时代受封为王的，只是鲜卑的西部大人，他们在后檀石槐鲜卑中并不占支配的地位，因此他们的受封与轲比能受封的意义也不一样。后者虽非檀石槐嫡系，其势力却在黄初末叶以后达到“控弦十余万骑，……得众死力，余部大人皆敬惮之”的地步。因此，轲比能的受封，完全可能被后来的拓跋人认作后檀石槐势力的历史性倾衰，即后者已完全跌落到中原王朝附庸的地位。在此之后，应当有另一股鲜卑势力出现，继续作为据有塞北而与中原王朝相对等的一种最高政治支配力量而存在。正是拓跋部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这个使命是在谁的手里完成的呢？答案当然只能够是拓跋力微，因为他是领导拓跋部走出阴山的诒汾的直接继承者。

种种迹象表明，道武帝拓跋珪一朝，是北魏政权重构拓跋先世史的关键时期。天兴元年，拓跋珪定都平城，在依照汉制“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的同时，“追尊成帝（按即成皇帝毛）已下及后号谥”，总

① 《三国志》卷三〇，《魏书·轲比能传》。附义、归义两王之封，事在“延康初”。按：曹丕于220年继丞相魏王位，因改汉“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延康元年冬十一月，又以受汉禅位改当年为“黄初元年”。

② 《三国志》卷三〇，《魏书·轲比能传》。同卷《鲜卑传》亦谓轲比能与步度根等“上贡献”。